日本的中國史學理論的探討

藤井志津枝

前言：評論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中國歷史的研究，特別是身爲日本人的我，首先必須認清日本史學界對中國史研究的觀點和動向，以及其所牽涉的一些問題。因爲只有從史學理論的反省和批判，才能自我檢討日本人內在的錯誤觀念，進一步開闢新的理論，對未來抱負展望。

在中華民國介紹日本史學界情況的，有在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出版的『史原』創刊號上發表的李永熾論文「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動向」。他在這篇論文，簡單地介紹日本戰後的三大學者，遠山茂樹、丸山眞男和大塚久雄，以及近代化論。然而他寫這篇論文的目的，在於「介紹」和當作借鏡而已，因此在結論說：「接受二次大戰洗禮之後，日本史學界呈現一片蓬勃氣象，理論深化，實證精密，史學的興盛，普遍引起人民對歷史的關心。但對於日本史學的未來趨勢，實在很難定下指標」（註一）。他於是坦白承認無法展望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方向。

接着，高明士經過從民國六十二年到七十年近十年間的研究，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出版『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一本專著。他在自序裏引用黃遵憲、梁啓超、戴季陶、陳固亭的話說：「這些專家的看法，說明近百年來我們對日本的瞭解的確太少。兩次中日戰爭，又加深雙方的民族仇恨，因而國人到現在對日本的理解可說還是相當陌生，遑論心平氣和地欣賞日本了」（註二）。基於這個認識，他從日本戰前的東洋史學的成立經過談起，討論其演變，以及戰後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新發展。雖然此書名爲『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但他所介紹的「新舊中國史料的研究成果」及「相關文獻目錄」，只限於他個人的研究範圍，即秦漢史、敦煌學、隋唐史等，不包括其餘的中國史部分。因爲此著作缺少結論或總評之類，是否能全盤的把握日本史學界研究的方向，不得而知。不過從文脈可以推測，他對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是以「新發展」來理解。這

正如美國社會科學所流行的「發展理論」（developing theory）。

日本在戰前的「東洋史學」和戰後的「中國史」研究，都有其成果和發展，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如果僅以「發展」的觀點去瞭解的話，難免是膚淺之論，不能洞察日本史學界內在的糾葛。日本戰後的中國史研究，是從研究學者內在的自我檢討和批判戰前的「東洋史學」開始。這又表示日本學者如何正當地繼承戰前的研究成果，而努力去克服「舊亞洲」史觀，創造新亞洲史觀的艱辛過程。高明士雖然也談到戰後日本學者的「良心」，但他也應該進一步去瞭解日本史學界的「傳統」難以改造的嚴重性。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復活，就是事實勝於雄辯。雖然日本較有「良心」的史學者，不厭其煩而再三地批判潛在於內心的「舊亞洲」史觀的傳統，摸索中國史研究的未來方向，但是面對根深蒂固難以去除的「舊亞洲」史觀，值得讓我們深思反省史學理論的根本問題。

本論文旨在探討日本戰前的東洋史觀，及戰後的批判和克服嘗試，最後以中國學者許介鱗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總批判」，來瞭解中國人克服「舊亞洲」史觀的一種努力，如何爲創造「新亞洲」史觀而奮鬪。

一、日本戰前的東洋史學的傳統

㈠ 日本的侵略東亞和東洋史研究的關係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從「鎖國」「攘夷」轉變爲「開國」「西化」，而確立天皇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從此以後，日本的國策奠定於學習西洋的「富國強兵」和「殖產興業」，推展爲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方向。日本爲了快速擠入西洋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利潤的行列，以發揚「皇威」爲口號，對內犧牲自由民權論，對外向亞洲鄰邦大肆侵略。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以現身實現「弱肉強食」，因爲侵略戰爭的勝利，使當局肯定了其武力侵犯政策的可行性，而對大陸膨脹主義更加強了信心。「東洋史」這一個名稱，就在此戰勝陶醉的氣氛之下誕生，這也是日本史和東洋史分離的起點，從此日本學者對被侵略的中國和朝鮮產生莫大的興趣。

軍事的「先行」和研究的「追隨」，是戰前日本東洋史研究的一種類型。因此隨着日本的侵略範圍的擴大，東洋史研究也逐漸的發展。在明治前期，歷史學者、語言學者、法制史家等，對朝鮮研究有濃厚的興趣。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日本達成併吞朝鮮的目的，從中國獲得「南滿」的利益，日本的學者開始着手「滿洲」及中國邊疆地區的研究。其後日軍積極地侵略中國本土，展開中日全面戰爭之後，也就興起了異常的研究中國熱。接着進入太平洋戰爭，提倡「大東亞共榮圈」，於是學者也對東南亞的研究產生興趣（註三）。所謂「東洋史」的發展，在本質上就是隨着日本所侵略的地區爲主要研究對象，而逐漸擴大「發展」。

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體制下，日本學者不能自主地爲追隨侵略而作學問，接受當局的指揮和援助進行研究。例如在台灣總督府統治之下有『台灣私法』『清國行政法』等的學術成果。在朝鮮總督府強權之下，有日本學者的朝鮮研究成績。在東亞各地的考古學上的新發見，也是受到軍方或「興亞院」或「國策公司」的援助。「東方文化學院」是東京帝國大學東洋研究所和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前身，這是日本外務省的對「支那」事業部，以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的賠償爲基金而設立經營的研究機構。

當時的日本學者還抱着以學術研究來報效國家的熱忱，去接近實行侵略政策的當局。例如東洋史學的開山祖、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白鳥庫吉，即抱着以學術研究來貢獻日本對滿韓「經營」的熱忱，說服「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後藤新平，於一九〇八年在滿鐵東京支社內，設立滿洲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在一九一三年出版『滿洲歷史地理』二本，『朝鮮歷史地理』二本，『文祿慶長之役』一本。此研究是以白鳥庫吉爲領導中心，參與研究工作者，有箭內亘、池內宏、松井等、稻葉岩吉、津田左右吉等，他們後來即成爲東洋史界的重鎮。

然而這些東洋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幾乎偏於地名或年代的詳細考證，對滿鐵經營的大陸侵略政策幫助不大。於是滿鐵當局於一九一四年停止此歷史地名的調查事業，但仍然資助出版經費。白鳥庫吉回到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之後繼續從事研究，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陸續出版『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共十六册，其中「滿洲地理歷史」部分，還翻譯成德文介紹給歐洲各國。

總之，日本的侵略東亞是促成日本學者對東洋史研究的興趣，而東洋史的研究在此侵略環境下逐漸發展。其研究成果不一定對日本的侵略國策有直接效用，但是當時日本學者並不懷疑自己在侵略體制下的地位，以及接受研究資助的意義，所以主觀上雖不產生自己的研究是協助侵略鄰邦的意識，但無形中却附會日本的侵略國策，而在客觀上扮演侵略亞洲鄰邦的一種

幫兇的角色。

(二) 日本的東洋史學在傳統上的特徵

戰前日本的東洋史研究，雖然跟侵略體制結合而進行，但這並不意味日本的史學者喜歡替軍方做宣傳，或專門從事鼓吹戰爭的推動工作。一般說來，日本學者也保持其學問的純粹性，努力不要被政治感染。例如前述的白鳥庫吉，其本人有以學問報效國家的熱忱，而和滿鐵結合進行其研究，但是白鳥身爲學者所做的研究畢竟是對國策無直接效用的純學術研究，也就是一種跟現實脫離的考證學。

從現實脫節，逃避現實問題，把自己關在學問的象牙塔裏，這種態度即成爲東洋史學的傳統特徵之一，而考證學也從此成爲正統的歷史研究方法。造成學問和現實的分離，其原因在於一方面日本侵略當局對武力很有信心，不需要完全靠學術研究來支撐侵略，而把學術研究當作一個裝飾品；另一方面日本學者爲了維護學問的純粹性，不願牽涉到現實的問題。

除此之外，日本學者也甘願將學問和思想分離，從學術上去除思想的因素，重視實證學而死抱考證學爲學問，因此缺乏思想也成爲東洋史學的另一傳統特徵。思想因素包括理論、學說，個人在政治上的主張和立場等一切。當時他們認爲只有拋棄思想，才能確保學術研究的純粹性。

因此日本戰前的東洋史學，如果有所成就，則在於對事實的個別考證上。但是由於去除了思想的因素，便缺乏全盤性體系的瞭解，而無法展望亞洲歷史的發展。而且又因與現實脫節，致對當時的局勢無法掌握，在如此沒有主見的情況下，只好追隨侵略的風潮。

日本傳統的東洋史學，最大的缺點在於無法展望亞洲歷史的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亞洲各地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日本學者在主觀上是爲維護學術研究的純粹性而努力，但因思想和現實脫離，不去觀察創造歷史的主體即亞洲的民族和運動，終於失去歷史的認識和判斷，而充滿了日本爲盟主的民族優越感。對亞洲的輕視和偏狹的優越感，也就是東洋史學最大的傳統特徵。

回顧戰前東京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完全在西洋史學影響之下成長。學者們所關心的，是歐洲的學術界的言論，因而學習西洋，一味追隨西洋，趕上西洋的「西洋化」爲研究的主要目的。因此當他們面對中國的歷代古典時，他們總是以西洋近

代史學的「合理主義」（rationalism），來批評漢學家所崇拜的聖人和經典，對中國的東西採取否定的態度。因此他們越研究中國越感到中國的一切是不合理的，中國是落後國家，漸漸地產生輕視中國和日本民族優越的觀念。津田左右吉認爲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文化結構，是基於西洋文化的普遍性發展，而把中國文化當作在本質上與日本文化不同的東西。因此他以中日兩國文化的比較，來證明日本文化具備了能接納西洋文化的優越性。

另一方面，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又稱支那學派），是以漢學家出身的內藤湖南爲中心，認爲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胎，而明治維新以後的文化也是中國文化中心地移動的結果。於是他把偉大的中國文化和落後的中國民族分開，認爲日本文化的使命，在於發揚和實踐中國文化的精神（註四）。

東京和京都的二個學派，雖然對中國文化的觀點不同，但都是強調日本民族在亞洲的優越性和領導地位。津田左右吉在『支那思想和日本』一書中，批評高倡東洋主義的鼓吹侵略者，但是又說日本是亞洲的先進國家，中國是落後國家，日本根本沒有一個可以從中國學習的東西，所以日本應該以世界性的現代文化來領導落後的中國（註五）。

東京帝大的東洋史學，用西洋近代的「合理主義」精神，來批評中國的不合理而進行破壞偶像，但其方向在於「脫亞」，而京都帝大的「大亞洲主義」也在日本侵略國策的發展之下，拋棄亞洲的平等連帶而強調日本的領導地位，故兩者都承認日本對大陸政策的正當性。這種東洋史學對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自主運動，當然無法把握其歷史發展，因爲他們的思想根底在於否定亞洲獨自的新發展。

二、日本戰後對東洋史學的批判

——以仁井田陞的法制史研究爲例——

仁井田陞（一九〇四—一九六六年）生於明治時代，到昭和時期成爲一位國際上著名的中國法制史學者。他畢業東京帝國大學之後，於一九二九年在東方文化學院任助教，從事唐令的研究，一九四二年東京帝國大學創設東洋文化研究所時，任東大教授兼該所研究員，戰後的一九五四年任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四年多，一九六四年退休，一九六五年赴倫敦大學「東洋非洲研究所」講學東洋法制史，因腦溢血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回國，六月去世。

他在早期研究唐代法令，在戰前的一九三三年出版『唐令拾遺』，一九三七年出版『唐宋法律文書之研究』，一九四二年出版『支那身分法史』。他在一九三九年參加東亞研究所學辦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調查北京工商的基爾特（guild）組織並加入滿鐵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經過這些調查研究的經驗，在戰後的一九五一年出版『中國的社會和基爾特』，一九五二年出版『中國的農村家族』、『中國法制史』，一九五九－六四年出版『中國法制史研究』四大卷的著作。

他因爲有到中國實地考察的經驗，脚踏實地的研究，在史學研究方法上能獲得突破性的轉換。他反省從來的考證學或解釋學的研究方法，僅將史料加以考據、整理和分析的態度，而將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結構中探討。他認爲法制是全盤性的社會規範，而把法制放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關連的考察中國歷史的發展。他的研究超過了法制史的範圍，牽涉到史觀和史學理論的問題，值得我們參考和研討。

他在戰後的觀點，可以代表在戰前不鼓吹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立場。他以純粹學者的立場，默默地從事研究，到戰後才憑其良心，開始檢討和批評戰前橫行無阻的「東洋權威主義」和「亞洲停滯論」等舊史觀。他的『中國法制史研究』四巨册，可以說是他一生研究的總結算。他不逃避現實，也不去除思想因素。他的歷史觀，不但在努力克服舊亞洲史觀，還從一般民衆的立場去瞭解歷史，給日本戰後的東洋史學界很大的影響。

㈠　東洋社會的「權威主義」

如果想瞭解中國社會的結構，必須先瞭解其內部秩序的主要支柱「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因爲權威主義是代表中國傳統的思惟，所謂「孝爲百行之本」「孝爲天地之常道」的家族道德，直接貫通於政治理念，而政治和倫理的公私關係尚未分化。東洋社會的思想、倫理、法意識、「封建」等一切概念，都要從權威主義去瞭解，才能談如何改造東洋的專制主義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改革，必須經過批判東洋的傳統權威之後，制定新的社會規範，才能達成。因此，探討權威主義，也就是探討東洋社會的「自由」的問題。

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不論是性惡說、或性善說等，都可以成爲權威主義的基礎。老子雖然描寫農村共同體社會的理想，但其「無爲」而治的「自然」觀念，使百姓放棄人爲，完全歸順大自然，服從絕對的聖人。法家和荀子，以「性惡說」肯定君主所制訂的禮（法），強制百姓遵從，提高君主的權威，成爲專制主義的基礎。孟子的「性善說」，以孝爲五倫的基本

秩序，而把五倫視爲天命，並非個人可以自由意志選擇的規律，於是「性善說」也成爲權威主義的基礎。孔孟的儒家思想盛行於漢代，這是董仲舒將之奠定爲漢代的專制主義。儒家思想到了宋代，朱熹將之構築成爲中國權威主義的最高理論。

近世儒學即朱子學，把「人倫」建立在宇宙自然的原理「天理」上，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種規定社會的上下關係的五倫的「人道」秩序，確立於自然的「天道」基礎上。人類社會的秩序既然是「天理」「天道」，都不是人的作爲所能爭的自然力所構成，於是無條件形成權威主義的秩序，成爲東洋的「自然法」的一種典型。朱子學的倫理規範，對內是以「君臣上下之分」爲基軸，規定五倫關係，而對外推行則變成「華夷內外之辨」。從東洋的專制主義來說，肯定和固定身分地位的秩序，是絕對的有利於權威主義。當然朱子學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從唐代中葉以後到宋代中央集權體制的成立和發展，是其學說成立的背景。自此以後，朱子學成爲官學，得到歷代權威主義的擁護。

至於東洋社會的「自由」，在傳統社會裏人們可以選擇二條路。其一是以無條件的恭順，完全順從天命，沉湎於傳統和自然，來達成自由。士君子的理想境界，是完全地遂行傳統的義務。中國人的這種態度，與西洋清教徒的批判傳統，視傳統爲非神聖的態度不同，從清教徒的立場來說，儒家的態度和認識是一種墮落。另外一條路是脫離現實的政治，放棄正面性的衝突和批判，沒入文學裏，逃避傳統權威的壓力。人們在老莊或道佛的世界裏，去發見能舒暢自己，而感到自由的境界。百姓對政治，只期待「眞明天子」的降臨，或等待「彌勒下生」來拯救衆生。官吏和儒家以嚴肅的外表扮演權威主義的主角，但是他們也把內心的「自由」，求諸於老莊或道佛的世界。明代的陽明學，就是從這種背景興起。

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是把權威構築於個人自己的內心裏，而他的弟子王畿、王艮等泰州學派，甚至肯定人欲，把人欲也當作一種自然。陽明學以反官學和反權威主義，逐漸吸收農工商業者擴大。到了明末李卓吾時代，學說更爲開放。他在其著作『首古錄』，論從上面的天子到下面的庶人都是一個人，天下萬民都是平等的。當時的文學作品如『西廂記』『水滸傳』等，也從道德的拘束開放，把文學和道德分開。不過李卓吾因其反權威主義的思想，而被權威主義犧牲。

然而陽明學派的反權威主義，並不否定聖賢的權威，亦即臣子對君父的恭順等倫理規範。因此批評權威主義的另一方面，又去依賴另一個「眞明天子」的權威。因爲這時中國的反權威主義，並不是從逃避現實的意識形態誕生，而是認清自己本身所處的東洋社會傳統的專制和奴隸的性格，爲克服此傳統的權威主義而奮鬪，去創造近代社會的自由思惟。到了現代，魯

迅發見他內在的「阿Q」，而他的自覺奴隸是創造新中國的開始（註六）。以上是仁井田陞對東洋社會的「權威主義」的看法。

㈡　批評西洋學者的東洋史觀

西洋學者的東洋史觀，大都以「風土」論，論證東洋的中國是陳年累月的侵染於專制主義，毫無歷史發展可言的停滯地帶，這就是所謂「亞細亞式停滯」論。

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思想家和政治哲學家孟德思鳩（C. L. de S. Montesquieu），在其名著『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依他在十八世紀的有關東洋社會的知識，來論「奴隸制東洋」的形態。他引證西洋在古代就有希臘式的民主主義和羅馬式的權利義務觀念，來抨擊中國的「王道政治」（仁政）不過是一種專制。他認爲亞洲是專制主義「風土」化的地帶，亞洲的奴隸制精神一直存在，而從來沒有消滅過奴隸制。在亞洲的整個歷史中，找不出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這就是他所論證的「東洋社會停滯」論。

十九世紀德國的哲學者黑格爾（G. W. F. Hegel），在其『世界史的哲學講義』（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ie der weltgeschichte）中，闡述精神的本質在於自我，自我之自由的實現過程，就是世界歷史的內容。他認爲自由（精神）之發展的第一階段（歷史的幼年期）是東洋的世界，第二階段（歷史的少年期）是希臘的世界，第三階段（歷史的成年期）是羅馬的世界，第四階段（歷史的老年期或成熟期）是日耳曼或基督教的世界。換言之，他認爲中國是「一個持續不變的帝國」（ein Reich der Dauer），是最缺乏自由（精神）最幼稚的國家，而只君主擁有肆無忌憚的「自由」，其他的人都服從君主專制的意思，因此導致東洋的專制（orientalische Despotie）。相對的，日耳曼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所體現的精神才是最高的形態，亦即普魯士的國家是世界精神（Weltgeist）的完結點。

在現代，則有韋特弗格（K. A. Wittfogel）繼承西方學者的各種說法，集「東洋專制主義」（orientalische Despotie）的大成。他在『東洋社會的理論』（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chaft）中，以治水灌漑的理論，說明東洋專制主義的由來。他認爲，西洋是靠雨水農耕的地帶，而東洋是灌漑農耕的地帶。東洋爲了大規模的治水事業，需要政治權力集中起來，推行此大規模的公共事業，因此導致東洋獨特的集權制，即東洋的專制主義，而阻礙其向西洋式分

權型的封建國家發展。而且東洋的生產方式，是靠農民的家族勞動來維持生產。這種東洋專制之下的農民型生產，跟西洋古代的奴隸和中世封建下的農奴完全不同。於是東洋的社會跟西洋的古代奴隸制絕了緣，是停滯在東洋專制而不能發展到封建社會，更不可能發展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然而對於日本，他說日本雖然屬於灌漑農耕地帶，但因爲不需要推行大規模的水利事業，所以能發展爲封建社會，認爲日本是亞洲的變異（variant）。

西洋學者的這些東洋史觀，可以說是充滿了西洋人的偏見，孟德斯鳩和黑格爾只看十八、十九世紀的東洋而論，顯然有其歷史視野的界限。孟德斯鳩以希臘和古代中國的政治比較，評論東洋是奴隸制地帶。但是從歷史事實考察，希臘的全市民共同參與的所謂直接民主制，是建立在奴隸制上面。希臘人並不把奴隸當做有人格的東西，奴隸不但不是政治的主體，連做政治客體的資格都沒有，只是跟牛馬一樣的商品而已。中國古代，雖然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壟斷了政治、道德、教育的一切價值，而絕大多數的庶民「小人」則是統治的對象。但是儒家以禮樂爲規範，以道德之教化爲政治的基本原則，所謂「禮治」「德治」，表示政治功能的概括性。孟德斯鳩所理解的東洋的政治奴隸是「小人」，然而「小人」起碼還是一個人，小人不是政治的主體至少還是政治的客體，並且是教化的對象。古代的希臘在政治方面優於中國的說法，值得懷疑，不足採信。

西洋的學者以地理上的「風土」論，論證東洋的「專制主義」和「停滯」論，但是專制主義並非東洋獨特的產品，西洋也曾經盛行絕對君主的專制主義。再說東洋「停滯」論，事實上，東洋並不一定「停滯」於任由西洋列強恣意侵略、追求利益、被統治的對象。歷史證明了中國和日本的古代社會，都是一個奴隸社會，而發展到中世的封建社會。中國在唐代末期的十世紀，開始從古代奴隸制轉移到宋代的中世封建農奴制，而到了明代末期的十六、十七世紀，地主緩和了對農奴的控制，農奴逐漸地強化土地的利用權，而確定永佃制，從此農奴制開始崩壞，到二十世紀進入最後的階段。不過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和中國的封建不同；西洋的封建制度是根據「忠誠契約」（Treudienstvertrag）的主從關係，一方違反契約時，他方即從此解除義務。中國的封建制度是以政治權力爲媒介的「家父長制」（Patriarchalismus）的命令服從關係，亦即天子是天命，對臣下是君命，對子女是父命，凡一切命令關係的原理，貫徹於上下秩序。因此，東洋的社會，並非西洋學者所說那樣永遠「停滯」的地帶，如果以自由精神的發展來看東洋，換言之從中國歷史的內面發展即農奴制的成立和其

否定的過程來看，便可以瞭解中國歷史雖然緩慢却有其發展。

以地理上的「風土」論當做絕對的歷史因素，並以西洋的「發展」和東洋的「停滯」對比評論，是西洋學者的東洋史觀的最大缺點。大規模的治水事業，並不一定成爲權力集中的最大因素，也可以成爲地方分權的基礎。東洋的「水」，只是瞭解東洋社會的一個因素而已，「風土」論並不能變成「必然」論。

日本學者依照西洋學者的東洋史觀，光挑選中國的落後的一面，說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同時說日本是亞洲中的西洋，幻想日本是亞洲的盟主。這種態度，極爲缺乏歷史實體的認識，僅依照「日本是亞洲中的西洋」理論，肯定日本之加入西洋列強侵略亞洲行列的話，是一種煽動的政治宣傳（Demagogie）。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是一方面對抗外來的壓力，拯救民族的危亡，另一方面跟封建體制鬪爭，獲得自我「自由」的實踐過程。歷史學家必須去瞭解阻礙歷史發展的條件，這也是中國史學者應該抱持的態度（註七）。

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和「現代化」論

㈠「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思想殘渣

日本在戰後之初，即從軍國主義轉換到和平主義的價值觀，普遍地承認日本在昭和初期發動的「大東亞戰爭」是一種侵略戰爭。並且面對戰後興起的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使歷史家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從前對亞洲缺乏眞正的瞭解，而未能展望亞洲歷史的新發展。雖然如此，日本人在感情上似乎仍不能完全否定自己過去的歷史。日本學者在感官上雖然含有一點罪惡感，但却逐漸試圖對「大東亞戰爭」解釋爲日本向「近代化」邁進的步驟，而歸於所謂「宿命」論。因爲近代日本在西洋列強的包圍下，只有獨立或殖民地化的「二者擇一」（alternative），日本爲了獨立，對內只好確立天皇制中央集權，對外則不得已地侵略亞洲各國。基於這種歷史認識，「宿命」論輕易地轉變爲「大東亞戰爭必然論」（龜井勝一郎、上山春平），再大胆地躍昇爲「肯定論」（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是肯定日本的「大東亞戰爭」，解釋爲抵抗西洋列強的戰爭，再曲解爲解放亞洲的戰爭，進而根本否定大東亞戰爭是侵略戰爭。

如果日本的「近代化」必然地向亞洲各國侵略，那麼日本必然地遭受亞洲被侵略民族的抵抗。因爲從被侵略的民族來說

，爲了民族的獨立及自由和平，不得不與帝國主義繼續抗戰，抗戰到最後獲勝贏得眞正的和平爲止。這也是亞洲人民爲實現「民族主義」，以自己的行動來創造新亞洲的血淋淋的歷史。難道當時的日本人抱着悲觀的「宿命」論，期望被徹底的戰敗及獲得城下之盟的「和平」？難道大多數的日本人都是與現實脫離，逃避現實，而只順從戰敗的命運與和平的潮流？以人類自由精神的發展來看亞洲的歷史，戰後亞洲人民的獨立發展和日本人思想的停滯，成爲對比。日本人享受戰敗帶來的「和平」和經濟繁榮之餘，仍然依依不捨地對自己的戰爭體驗感到懷念，試圖乘機提出辯解，甚至去肯定大東亞戰爭爲「聖戰」。從此亦可證明日本人的「舊亞洲」史觀，儘管遭受戰敗的打擊，却也未能拭掉其殘渣。

(二) 許介鱗對「現代化」論的批評

中國的政治學者許介鱗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日本政治論』，說明爲什麼要從中國人的立場批判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他認爲日本人的老一輩，大多數是「戰爭協力者」；年輕的一輩，對大東亞戰爭沒有什麼印象，而自動地去翻開歷史徹底反省的更是少數。「林房雄的這種曲解日本歷史和亞洲歷史，歌頌日本軍國主義的書本，於是流行於十字街頭，不斷地毒害日本人的思想，在此需要一本徹底批判其史觀和論理的書籍來解毒。既然日本人自己無法徹底批判，就由我們來做，以免日本將來重踏『大東亞戰爭』悲劇的覆轍。」（註八）

他的這種態度，超越了感官上的好惡，如盲目讚揚或無理謾罵的層次，把日本近代侵略中國的歷史當做活生生的材料，經過冷靜的思考而深入的探討之後，對「強者是公理，弱者及被侵略者是活該」（註九）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提出疑問。

他認爲大東亞戰爭必然論和肯定論，是由美國「現代化」論的流行而引起的。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國際「冷戰」加深，美國的遠東政策也從佔領初期的日本爲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政策轉變，讓日本舊領導階層重返而佔有樞要的地位，於是一時凍結的「大東亞戰爭」史觀，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另外，美國以美援負起第三世界的工業化或現代化的使命，但發見在非西洋國家中只有日本脫穎而出，迅速地邁進工業化和現代化。於是美國學者，以文化、傳統、宗教、倫理等非經濟因素，來重新比較日本和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強調日本傳統有類似西洋的封建制的優點，並從國民所得、成長率、資本係數等統計數字，讚揚日本的工業化或現代化的成就。不過，現代化論者又說，十九世紀的「西洋的衝擊」（Western impact）是日本

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給西洋的侵略一個合理的解釋。當然美國學者在評論日本的現代化過程時，儘量迴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的因果關係。

日本現代化論的代表旗手賴謝和（Edwin O. Reichauer）於一九六一年被任命爲駐日大使，在日本著名雜誌『中央公論』該年九月號發表「日本近代化的歷史評價」之後，一連串地發表現代化論，爲現代化論做宣傳和普及工作。林房雄也跟着美國現代化論學者的尾巴，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在『中央公論』發表其「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依許介鱗的研究，這是美國「現代化」論在日本播下的孽種（註一〇）。

不論是英國學者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的「文明」史觀，或是美國學者的「現代化」史觀，都是在肯定「弱肉強食」的世界，站在侵略者的立場看歷史。他們以「文明」的福音，「現代化」的漂亮口號，去迷惑和侵略所謂「落後國家」。當然，他們將「西洋的侵略」改以「西洋的衝擊」去沖淡欺騙，舊殖民地獨立以後，也不直稱爲「後進國」，改稱爲「低開發國家」（under-develop country）或「開發中國家」（develop = exploit），這是他們企圖「由西洋來開發」（development by west）的緣故。他們在方法論上，設定「未開社會」和「文明社會」，或者是「前現代社會」(pre-modern society）和「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的二個對比的概念，然後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必定從「前現代社會」（未開社會）轉移到「現代社會」，這個過程就是「文明化」或「現代化」。其用意在於以「西洋」爲主體來看歷史，「由西洋來文明化」（civilization by west），「由西洋來現代化」（modernization by west），而蔑視非西洋國家的主體性。他們強調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的實證主義，而標榜「價值的中立」（value free），利用統計學的數字去證明那一個國家或社會，如何（how）爲何（why）現代化，顯得好像非常客觀、非常堂皇動聽。當他們的這種方法應用在亞非等第三世界國家而碰釘子，顯露出方法論上的破綻時，他們還是不放棄「西洋爲主體」的侵略者立場，將「帝國主義論」改頭換面稱爲「依靠論」（dependentia），這就是當今美國芝加哥學派正在開發的新理論。這種方法論的最大缺陷，在於以「計量」去沖淡和抹殺「本質」的問題。畢竟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和重建，非從「本質」的問題着手探討不可，然而這裏的史學家，很多人都是一窩蜂的去模仿「計量」的經驗科學，這是政治學者許介鱗在課堂上的感歎。

許介鱗的日文版著作『從中國人的觀點——近代日本論』，更進一步的批判日本的政治學泰斗丸山眞男的『日本近代政

治思想史』，認爲日本的「一君萬民」的思惟，並不如丸山所主張的在幕府末年產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現。而這種思想，並不是西方霍布士（Thomas Hobbes）之流的「絕對主義」，而是北一輝在「昭和維新」運動所提示的「國家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在擁戴佔有政治正統性的天皇，剷除一切在天皇和萬民之間的腐敗的特權階級，造出同質而平等的國民。因爲如果不誅滅君側的奸賊（即腐敗的特權階級），則日本向滿蒙、華北的中國大陸侵略所得的利益，則歸於腐敗的特權階級所有，不能成爲日本國民全體的利益，於是日本很難結集成「舉國一體」的體制，向「大東亞戰爭」的大目標再行前進（註一一）。許介鱗從日本的「內政」和「外侵」的關係，深刻的剔出日本近代史的眞相和全貌，不但給日本人深省的機會，同時給日本人興起對亞洲人的認同感。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是代表日本人的「舊亞洲」史觀，最典型的軍國主義思想。其思想的批判和克服，應該是全亞洲人共同的課題，經由對「肯定論」的批判，才能重建亞洲和世界的新關係。許介鱗對「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展開徹底的批判，這是從過去中國的論著如戴季陶的『日本論』所得不到的。現代學者能夠保持冷靜和客觀的態度，即可克服像戴季陶那樣憑自己政治立場的偏好論斷的缺點。

結論：東洋史學的體質需要改革

克服東洋史學的「舊亞洲」史觀，不能依靠西洋學者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不能當做一時的熱門話題，應該不分中日國籍，由每一個歷史研究學者去認眞思考和檢討，因爲這是身爲學者對歷史學的發展應該負責的問題。因爲日本的侵略和日本史學家追隨侵略理論的結果，造成亞洲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無此的犧牲和損失，這種史實靠西洋學者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如何解釋也無法自圓其說。然而很不幸地，「舊亞洲」吏觀隨時都有改頭換面提出來的迹象，從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新停滯論」的抬頭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從此可見日本人要克服「舊亞洲」史觀，是如何地困難！因此，爲了徹底地改革東洋史學的體質，我們應該一再地提出日本「侵略」的史實，以便能從對「侵略」的研究和檢討中，尋找出一九八〇年代的史學者積極參與創造新亞洲歷史的行列的途徑。

註釋

註一：『史原』創刊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編，台北，一九七〇年，頁八四。

註二：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台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二年，頁一。

註三：例如在台北帝國大學設置「南方研究室」，收集東南亞各地區的資料開始從事研究。

註四：內藤虎次郎（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京都，弘文堂，一九二四年。內藤『支那論』附新支那論，東京，創元社，一九三八年。

註五：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岩波新書3），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三八年。

註六：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增訂版（岩波全書165），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頁一〇——五四。

註七：同上書，頁五五——六一。

註八：許介鱗『日本政治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七年，頁二。

註九：同上書，頁三〇一。

註十：許介鱗『中國人の視座から——近代日本論』，東京，そしえて，頁一九。

註十一：同上書，頁二一一——二一二。

其他參考書：東京大學文學部史學會編『史學雜誌』，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八〇年各號。